

秋风辞（组诗）

刘向民

秋风吹
秋风浩浩。吹过来
金黄的色彩蓬勃而生
豆子枝叶厚实，内心淳朴
广阔的沁香与营养厚重
隐藏在每一颗豆粒里

秋风吹。风从山梁上刮起
拂进山林，尽染叶红
热烈的气氛渐次展开
从山脚到山顶，不停翻卷
让秋天的等高线一再攀升

被风吹乱心事的高粱
被看透了。脸涨得通红
高高的个子向着土地俯身
一节节的身干正变得结实
为村庄搭建一座座屋顶

牛一直低着头，默默
在草中选着嫩叶和湿润的草根
一群鸟呼啦啦地飞过天空
牛抬头张望了一下，远处
炊烟袅袅，直上天空

河流
流水顺着季节
退回河岸。夏天的水
留下一再冲击的姿势
刻下勇往直前的抒情

水草也开花和结籽
叶子慢慢变黄，变得老了
魂魄还在，与水融合
等待下一个春天的到来

小鱼还在游曳
无声地荡起细细的水波
一群透明的虾绕开横行的螃蟹
张开的大钳异常凶险

月光明亮，河水闪闪
秋风贴着河岸行走
安静的村庄在夜里
做着河流奔波的梦

山野
树不断落叶，一片片
无序地散落，叠压
草渐渐凋零，一根根被虚空
把结实的籽粒举得高些再高些

野韭的根悄悄收紧触角
聚集温暖，延长秋天的情怀
牵牛花的种子散落一地
黑色的，但能孕育红色的花朵

瘦小的蝴蝶努力着飞翔
娇娇的身躯随着秋风摆动
落在一棵盛开的山菊花上
是今秋最后的灵动与美丽

黄昏
夕阳贴着山梁
血红的光芒浸染着云彩
沉重的质地一再压低天空
秋天被固定在原野上

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
在刚刚收割的谷地里翻腾
金黄的谷粒滚落泥土
又被尖锐的喙一一捡起

被遗忘的稻草人孑立
头发散乱，两耳撕裂
破烂的衣衫飘飘
回荡有声。依然精神饱满

太阳晃了一下，慢慢下沉
隐入山后时，天就暗了
秋风似乎慢了些
紧贴着乡村，轻轻耳语

秋风帖
原野上，五彩斑斓
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如此妖娆，是一场秋风
从北到南，越过蜿蜒的长城
描绘大江南北的美色

蓝色的天，白色的云
涌动的天空下梦幻莫测
青青的是河流
白白的是棉花
金色的就是千顷万顷的稻谷

飞鸟盘旋，与秋风同行
不可言说的惬意
与尘世相吻合
与秋风同行，飞翔的过程
就是幸福。收获粮食与快乐

文化

阅读苏洵

■ 杨思辉

在唐宋八大家中，苏洵是最不引人关注的，在接受史上，他的名气远远不及他的儿子苏轼。在苏轼的盛名之下，身为父亲的苏洵似乎没有像儿子苏轼那样受到众人的追捧与推崇，除了少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及唐宋文学的学者、专家，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这位“一时之杰，百世所宗”的大思想家、政论家和文学家。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似乎被人们所忽视了！

一

章的指责，说“老苏文字初亦喜看，后觉得自家思想都不正当，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故宜以欧、曾文字为正”。朱熹这番“思想都不正当”的论断流传开来，南宋以后研读古文的学者，对待苏洵都存在偏见和主观判断，谴责之声不绝于耳，他们对苏洵文化身份所持的批判态度，不能公正地评定苏洵其人及文章的价值，致使明至清以来对苏洵产生了许多误读，严重影响了苏洵思想在更大范围的传播。

在唐宋八大家中，真正能称得上思想家的有韩愈、王安石、苏洵和柳宗元。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三者兼具的有韩愈、王安石。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的有欧阳修、曾巩；苏轼和苏辙虽然担任过一定的官职，但还算不上政治家，只能算文学家。苏洵作为“唐宋八大家”中的思想家，其思想圆融通透，主要体现在他对古代哲学思想特别是对孔孟思想的继承与新的阐发。苏洵推崇和尊奉的是儒家的“王道”思想，但反对空谈性理，主张经世致用。他提出“义利结合”的观点，认为治国需要兼顾道德与实效。他一反孔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传统观点，认为“利之所在，天下趋之”，“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亡”，将“利”提升到与“义”同等的价值地位，从而突破了传统义利观的束缚。他以人情论解释六经，把六经解释为圣人权谋智术运用结果的认识，即圣人为了治理混乱的人世，深刻洞察并巧妙利用、引导、约束“人情”而创设的一套精妙制度和工具。这种解释似乎有些离经叛道且夸大圣人的作用，然而，相较于把经典神圣化、教条化的认识，这种解释更充满了现实关怀、理性思辨和政治智慧，在宋代经学史上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他晚年解《易》，剥去了“诸儒”的“附会之说”，以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它赋予经典的一种开放、通透的形象，使之与时俱进。经世致用，为儒学的未来提供了美妙的发展方向。在闭门苦读的十年里，苏洵醉心于经史百家之书，他梳理了自孔子以来儒家的传统体系：自从孔子去世后，一百多年后孟子出生；孟子之后，隔了数十年而产生了荀子；荀子之后，过了二百多年的西汉，杨雄被世人称道；杨雄死后，有一千多年没有他的继承人，而后接续他的人是韩愈。苏洵接着提出自己的疑问：韩愈去世已经三百年了，不知道天下将其后继者派定给谁？谁来继承韩愈的事业，成为扭转一代学术风尚的大宗师？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出现，朝廷应该怎样安顿他？苏洵认为，孔子之后，孟子、荀子、杨雄、韩愈四人是几千年历史上无以复加的文化大儒，我能“得齿于四人者之中”，实在愧不敢当。但我们也不难看出，他实际是以思想家韩愈的继承者自任的。苏洵虽然以政论散文著称，“一时后生学者皆尊其贤，学其文，以为师法”，但他并不专意文词，而甘愿“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这显然更符合思想家的特征。

苏洵同时也是北宋颇有远见、思想极为深刻的政论家，并以研究权术在社会上广为人知。苏洵长期浸淫于历代论说文名家名著，所以，他的文章具有强烈的政论色彩。第一个提出“唐宋八大家”指称的明代学者茅坤说，苏洵的文章“出于荀卿、孟轲《战国策》诸家”，有“博大之识，奇崛之气”。苏洵在《六国论》《管仲论》《审敌》《权书》《衡论》等文章中都深刻剖析了北宋王朝面临的内忧外患，提出了许多富有洞察力的见解和政治改革主张。他的主张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试图用一套合理有效的治理手段来调整和完善当时的社会、政治秩序，并最终实现富国强兵的宏愿。苏洵一生虽未能“达则兼济天下”，但他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和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渴望朝廷吸纳像他这样没有科举出身的布衣之徒进入官场，一展抱负，为国家和百姓做出贡献。他指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视”、“定所尚”，制定好带根本性的指导方针。“譬如主张信用腹心之臣。他认为，不论是夺取天下还是治理天下，君主都需要有可与议“机”的腹心之臣。对那些关键时刻表现出色，在困难面前保持忠诚和勇敢的人，择定之后就信用他们，让其真正发挥作用。他还主张用人不拘一格，特别是选拔官吏应重真才实学，任人唯贤。在加强吏治方面，则主张“尚威”。他指责宋王朝，不重视选择边远地方的官吏，往往把边远之郡作为安置被贬官吏的地方。苏洵认为，“天下之势，远近如一”，不应该厚此薄彼。就远郡与近郡比较，认为近郡官吏之贤否，容易为朝廷所知，而远郡官吏，“虽千百为辈，朝廷不知也”。正因为朝廷不重视边远地方的官吏选择，贪官污吏可能在这些地方为所欲为。他认为，边远郡皆一方安危所系，“勿轻授脏吏”。他的这些论述，即便是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作为文学家，苏洵的文学成就虽然极具影响力，但显然不如他的儿子苏轼。苏洵对写作是严肃而崇高的，辞章之美、名声之盛，他都没有放在心上，他在意的是文章对社会产生有益影响。这就说明，苏洵并非传统意义上舞文弄墨的纯粹文人，而是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和心忧天下的豪杰之士，其一生志在用世。他与两个儿子的文学风格截然不同。苏洵的文章不再是一种文艺的形式，而是承载着道德、士气、风骨与文人的理想，因此更加注重“文”与“道”的关系，他是用文学的力量重新建立世道人心。苏洵的文章中没有心灵鸡汤，所以，当人们面临失意、挫折

和焦虑的时候，是不太容易从苏洵的文学里寻找到慰藉，反而很容易在苏东坡和欧阳修的诗词里得到文学力量的抚慰，这也许就是苏洵没有受到后世大众“追捧”的主要原因。即便如此，苏洵在文学史上仍有很高的地位。欧阳修说，苏洵的文章“博于古而宜于今天，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曾巩评价苏洵之文“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其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这可算是对苏洵一生文学成就的定评。

三

如果我们把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作比较的话，那么，苏洵是学者，苏轼是文学家，苏辙介于学者与文学家之间。苏洵除了道德、学问令人景仰之外，他还有三个方面的形象受众颇广，影响深远，甚至后世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符号来接受。一是大器晚成形象，二是励志典型形象，三是教育风范形象。这些形象与文学叠加复合凝聚成一个文化苏洵的形象。因此，苏洵在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价值远超个人的文学价值，在当今，苏洵的学行仍然具有非凡的文化史意义。

苏洵最广为人知的特点就是他的“晚学”。苏洵并非年少成名，37岁才写出好文章《六国论》。相反，他年轻时“少不喜学”，游历四方，直到27岁才幡然醒悟，认识到读书学习的重要性，这种古代科举入仕的背景下，开语可谓相当晚矣。他从27岁前的“不学浪子”到一代思想家、政论家、文学家的蜕变，极具传奇色彩，成为后世的一本活生生的励志教材，具有超越时代的激励价值。苏洵的人生经历告诉人们，无论多大的年龄，立志就不分早晚，只要心中有梦想，人生的奋斗，任何时候开始都没有“为时已晚”。他给那些渴望突破年龄桎梏，实现自我超越的人以巨大的希望和鼓舞。为所有在人生道路上探索、奋斗，拼搏，尤其是那些经历过迷茫或起步较晚的人，提供了一盏永不消失的指路明灯，这是苏洵给后世最大的精神启示。

科举考试失败后，苏洵对科举制度和朝廷产生了失望。鉴于自己少壮不喜学，老大“无成”的教训，转而将希望寄托在他的两个儿子身上，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予苏轼、苏辙，对他们进行了精心的培养。从苏轼十岁开始，苏洵就亲自教导两个儿子读书，要求他们每天都要背诵和抄阅古籍经典、熟记经史。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苏轼“少与辙皆师先君”。苏轼十多岁的时候，苏洵就叫他作《夏侯太初论》，苏轼竟写出了“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斧；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这样的警句。苏洵曾叫苏轼模拟欧阳修的《谢官诏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及马表》，苏轼仿效欧阳修的文章也写得很好，以致苏洵高兴地说：“此子他日自用之”。为了两个儿子的未来发展，苏洵把他们带出四川眉山，游历京师，结交欧阳修等文坛领袖，为苏轼兄弟铺就了进入主流文化圈的路径。苏轼20岁中进士时，欧阳修对其文章大加赞赏。正是苏洵中年携二子进京，得到欧阳修的赏识才名震文坛，父子三人成为当时学术界的明星，最终成为闻名于世的“三苏”。苏洵与苏轼、苏辙以其卓越的创造才能和辉煌的文学成就，同登“唐宋八大家”之列，他们一家人占了“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个，“一门父子三词客”，开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先例，堪称我国文坛的千秋佳话，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化现象之一。

苏洵是“唐宋八大家”中唯一的科举考试失败者。多次科举考试失败并没有消磨他的意志，他没有沮丧、气馁和沉沦，而是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凭借其卓越的文章和思想，向当时展示自己的才华。苏洵曾自述，“数年来退居山野，自分永弃，与世俗日疏阔，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他在逆境中，坚守正确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推广传播正义和公正的行为，撰写出大量文道合一的“有用之言”，这在古代士人中并不多见。自古以来，凡是胸藏锦绣的士人，大多渴望获取高位，而一旦求“位”不得，要么像屈原那样一肚子委屈、不满，要么像杜甫、孟浩然那样寄身诗赋，或者以隐居、求仙等方式表达怀才不遇的失望，常心怀耿耿。苏洵则不然，撇开他的学问不谈，就凭如何安顿自己遭受困厄的心灵方面，对后人的启发相当深刻而实际。在北宋文人中，苏洵既不求仙信佛，也不吟风弄月，又不谈道言性，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苏洵善于独立思考，非常理性、务实，不人云亦云，罕有迂腐的宏生意气。他一生希望通过著述、求官来弘道，又坦然面对现实，自得其乐，表现出不系穷通，以儒学为根本，以入世为自己天职，致力于社会进步的主体精神，充分展现出中华文化最积极向上的部分，给后世以无穷的激励和启迪！

苏洵的一生是一部关于疏狂、觉醒与奋斗的励志史诗。他的人生经历生动地阐释了起点并不决定人生的终点，觉醒和奋斗才能实现人生价值的终极意义。他从年轻时的疏狂，到27岁的觉醒，再到面对挫折，追求学术，阐释新哲理义理，展现出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的韧性。他的奋斗不仅成就自我，惠及子孙，更是影响后世。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而改变则需要永不言弃！

4 今日兴文

苏洵是四川眉山人，生于1009年，卒于1066年，他一生只活了五十八岁。青少年时代的苏洵性格执拗，不学无术，放浪不拘，只知游山玩水，后来大彻大悟。他自己说“二十五岁始知读书”，欧阳修说他“年二十七始大发愤”。古人平均寿命40-50岁，按常理，这个年龄的人不会再在学业上去有所追求了，即便是当今，27岁才发愤读书也常常有“为时晚矣”的哀叹。但苏洵却颇有信心地说：“吾自视，今犹可学”。他的这种“自信”，并没有给家人带来任何欣喜，不仅家人为他的前途忧虑，亲戚邻里也和他的前途担忧。他的妻子程氏夫人对丈夫游荡不学“耿耿不乐”。苏洵妻子程氏出自名门望族，曾经受过良好教育，是颇有学识和志气的女子。她鼓励苏洵追求学问，希望他能发奋苦读，有所作为，“我欲言之久矣”。然而，其父苏序对儿子苏洵的前途与未来并不“担心”，对别人的疑惑不解和责怪，苏序只是“笑而不答”。有乡里人问这是为什么呢？苏序笑着说“非尔所知也”！

为什么苏序对儿子苏洵的未来那么充满信心？这当然是源于父亲对儿子的了解。作为父亲，苏序对儿子苏洵不喜学的“毛病”是知晓的。苏序对苏洵的“纵而不问”或“笑而不答”，乃至“放任不管”，看上去有违常理，实际上是苏序对苏洵个性特征的充分保护和尊重，让他意识到自己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苏序知道儿子禀赋颖异，气质谨严，思想独立，个性鲜明。在他眼里，苏洵不愿受拘束，特别是不愿受声律、句读之学等科举之学的约束。他深知儿子并不是浑噩之辈，是有理想、有抱负、有见地之人，相信他有一天会自知犯错，下定决心，彻底改正以前所犯的错误。大文豪欧阳修则慧眼独具，一直以来就看好苏洵的未来前程，说只要苏洵能静下心来苦读，是不难“大究六经百家之说”的。苏洵后来曾说：“知我者惟吾父与欧阳公也”。

苏洵的人生态度真正发生重大变化，是在他的长子苏轼出生之后，那时苏洵年已二十有八，都快而立之年了，他追悔自己美好的光阴白白地浪费掉，没有珍惜和利用好这段宝贵的时光，痛自鞭策“年已壮，犹不知书”。他的哥哥、内兄、两个姐夫都已科考成功，行将为官做吏，对他刺激很大。苏洵本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科举进入庙堂，获取功名，摆脱布衣生活和贫困日子，试图通过施展个人才华，实现其经世济民的宏大抱负。可惜造物弄人，命运之神并没有垂青这位旷世奇才。从27岁考到37岁这十年里，他参加过四次科举考试，但屡试不第，无一例外都落榜了。苏洵科考的落榜，也是预料之中。他不长于“声律记问”之学的个性特征，对繁琐枯燥的科考这一套不感兴趣，屡试不中也就很自然了。在苏洵看来，科考入卷僵化，严重束缚自己的思想，使他不得自由。苏洵已经意识到，如果再在科举试策这条道路上折腾下去，对他而言，可能永远没有出路，必须另谋他径，改变方向和策略。于是，在他37岁时作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一把火烧了自己10多年为应付科举考试而写的数百篇文章，从此不再参加科考。这不仅是对“过去”的告别，更表达了对“未来”的锻造、革新，以及从头再来的决心。放弃科考后，没有了功名的羁绊，科举的束缚，苏洵转为对学术的钻研，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学术思想，潜心著述，探寻治国之道。他把自己关在书斋里，闭门谢客，“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遍读经史子集，经过这样的含英咀华，多年苦修，终成正果，进入了写作的最佳状态，下笔“顷刻数千言，其纵横上下，出入驰骋，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最终厚积薄发，出神入化，成为上继韩、欧，下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一位承上启下的杰出人物，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降及明、清，苏洵文章更成为士人学习的榜样。

苏洵的一生，从少年不学，到焚稿苦读，绝意于科举考试，再到潜心古文，著述立说，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宋仁宗嘉祐年间，他带着儿子苏轼、苏辙来到京师开封，当时的翰林学士欧阳修把他的作品二十二篇呈上朝廷，得到积极评价。宰相韩琦见他的文章写得好，上奏皇帝，召试舍人院，但他极不以为然，认为朝廷安排的考试是对自己水平的严重不信任，推辞不愿应试。直到五十多岁，由欧阳修推荐才得一个县主簿的小官，留京参与《太常因革礼》的编修。治平三年（1066）四月，带着对仕途不如意的深刻无奈，年仅五十八岁的苏洵走完了自己劳苦的一生。后来，赏识他的欧阳修感叹：“诸老谁能先贾谊，君王犹未识相如。”来不及重用他的宰相韩琦自责：“名儒升用晚，厚愧莫先予。”尽管苏洵一生未曾官途得志过，平生抱负没能施展，但他能及时调整人生的轨迹，开启另一种活法，走自己的路，醉心于学，让他在科举之外，焕发出别样的人生况味，并凭借自己的学术文章，乃以布衣身份而名动公卿、誉满天下。

二

苏洵的文章，生前就已经受到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的推崇。自明末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以来，他的文章和名字更是家喻户晓、广泛流传。但是，由于宋明理学桎梏，特别是理学家朱熹对苏洵文